

# 苏轼的认罪忏悔录

——读苏轼《到黄州谢表》

非飞鸟

翻开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唐宋八大家·苏轼》，第一篇文章《到黄州谢表》赫然在目。你万万想不到吧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豪苏轼，后人为他编辑的文学选本，第一篇竟然是从死牢里走出来后写的认罪忏悔书。

公元1080年正月初一，大宋王朝的过年气氛被一场大雪压得喘不过气。就在前一天，一个瘦削的中年人带着官差文书，拖着沉重的步子踏进了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地界。他叫苏轼，刚从御史台的大牢里放出来，罪名是“写诗诽谤朝廷、攻击新法”，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“乌台诗案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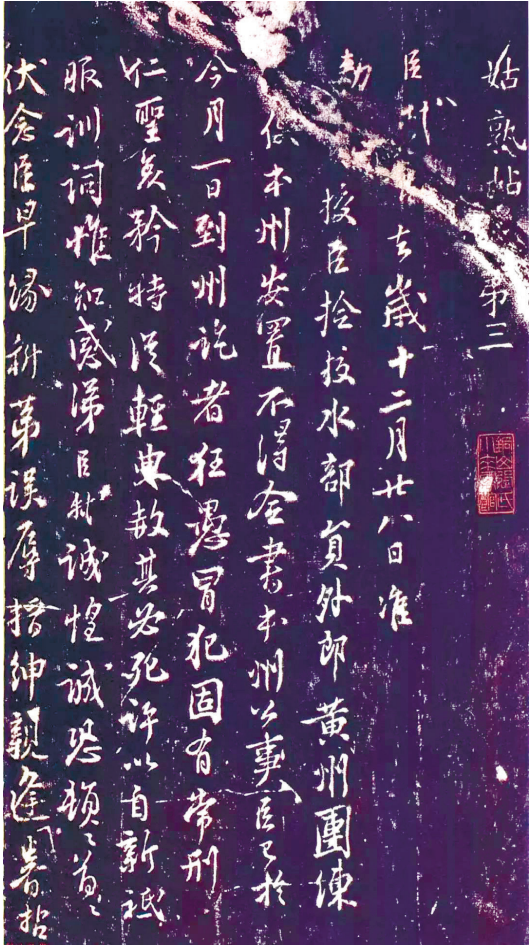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多月前，大文豪苏轼还在汴京的监狱里等死。他的政敌李定、舒宣等人，以苏大文豪的诗句作为刀剑，攻击他“恨皇上、骂变法”。比如苏大文豪写的《山村五绝》中的诗句“岂是闻韶解忘味，邇来三月食无盐”，就被活脱脱解读成讽刺朝廷食盐专卖，搞得人民疾苦，百姓三月不知盐味。而《王复秀才所居双桧》之二中的诗句“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唯有蛰龙知”，则被别有用心地解读成“皇上在龙位，你偏偏去歌颂地下的蛰龙，这不是反心是什么？”可见，搞文字工作，尤其是搞文学，在特殊的年代，是一个非常高危的职业，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，因为文字狱最难以辩解，因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！

要不是弟弟苏辙上书求情，太后出面说话，连政敌王安石都站出来劝说“圣朝不宜诛名士”，恐怕苏轼这颗脑袋早就搬家了。但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尽管皇上或许知道他被构陷属实，但权衡各方因素，苏轼最终还是被贬为“黄州团练副使”——一个不入流的武官虚职，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地方武装部改非副职吧。而且特别注明“本州安置，不得签书公事”，意思就是：你人就待在黄州，哪也不许去，公文不许碰，政务不许管。本质上就是软禁——要是在今天，这也算是一种惩罚式“躺平”吧。

发配黄州，这事还不算完。按照惯例，到黄州的第二天，苏轼需要写一份“谢表”，以感谢皇帝不杀之恩。我们今天读这份谢表，虽然感恩之心溢于言表，但透过感恩的文字，倒像是一封被迫承认的认罪忏悔录。苏轼在《到黄州谢表》里先写了朝廷对自己的处理结果，然后分析自己被处理的原因。他写道：“狂愚冒犯，固有常刑。仁圣矜怜，特从轻典。赦其必死，许以自新。”称自己这种狂妄愚蠢的家伙，本来该被处死，而皇上仁慈，却给了最轻的判罚，饶了自己的命，还给了改过自新的机会。自己表示“祇服辞训，惟知感涕”，对皇上的恩典感激涕零。然后他开始悔恨：“臣用意过当，目趋于迷……茫如醉梦之中，不知言语之出。”说自己用意太过，思维钻进了死胡同。那段日子就像喝醉了做梦一样，自己都不知道说了什么混账话。他说得最严重最诚恳也最打动人心的是一段是，“案罪责情，固宜伏斧钺于两观；推恩屈法，犹当御魑魅于三危。岂谓尚沾散员，更叨善地。”意思是说，按我的罪过，砍头都不为过。就算宽大处理，也该把我流放到最远的蛮荒之地。没想到皇上还给我保留了个官职，让我到一个还算不错的地方来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在古代，被判流放，还要给皇帝老儿

写一封感谢信，这大约也算得一个独有的文化特色。

“伏斧钺”是死刑，而“御魑魅”则是借用舜曾流放四凶于四边，使当魑魅之灾的典故，喻指贬谪。苏轼列举这两种非常严重的后果来证明皇恩浩荡，你看，皇上没有给我不可承受两种后果，反而给了一条较好的活路。这种写法，不是在炫耀，而是一个被皇权碾碎了的文人，在用最谦卑的姿态祈求生存，也用事实证明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道理。苏轼在《到黄州谢表》中写道，“伏惟此恩，何以为报。惟当蔬食没齿，杜门思愆。”发誓要报答皇恩，闭门思过，吃素度



日，珍惜恩典。如果需要，甚至可以死在战场上报答君恩。

一个以豪放著称的诗人，为什么写得这么卑微？为什么尊严扫地？不是他怂，是他真的怕了。乌台诗案前后持续四个月时间，苏轼在狱中多次想到自杀。狱卒曾在他身上搜出两包毒药，他一开始做好了死的准备，甚至还写了两首绝命诗，托人带出去给弟弟苏辙。

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，苏轼在谢表中一再承认自己错了，一再地感谢皇恩。他字字考究、处处用心，绝不能让皇帝和反对自己的人看出内心有一丝一毫

的抵触情绪，必须通篇体现皇恩浩荡、感谢不杀之恩。他把忏悔写得越深，认罪悔罪的感情越恳切，活命的把握才越大。

可苏轼终究是一个“一肚皮不合时宜”的人，他哪里会觉得自己错了呢？我们来读读他在黄州期间写的另一首词《卜算子·黄州定慧院寓居作》：

缺月挂疏桐，漏断人初静。谁见幽人独往来，缥缈孤鸿影。  
 惊起却回头，有恨无人省。拣尽寒枝不肯栖，寂寞沙洲冷。

这首词，苏轼以孤鸿自喻，写自己的艰难处境。那只半夜飞过的孤鸿，挑遍了所有树枝都不肯停下来，最后还是落在冰冷的沙洲上。凄不凄凉？悲不悲哀？委不委屈？

苏轼在谢表里写的是“臣罪当诛”，可深夜无人的时候，他心里想的是“有恨无人省”。他坚持的东西，是反对激进变法、体恤民生疾苦，事实上，他至死没有觉得自己是错的。但为了活下去，他必须狠狠地对自己开刀，用最卑微的方式，向皇帝忏悔、向皇权屈服。由此可见，《到黄州谢表》并不是一篇简单的认罪书，而是一个不得不向权力低头的知识分子，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屠刀落下之后，被迫进行的一场深刻忏悔。

非常有趣的是，这场“深刻”的忏悔，的确触动了苏轼最柔软的内心。经历了“乌台诗案”这场浩劫，苏轼实现了人生的蜕变，他慢慢接受了仕途无望、抱负难展的残酷现实，重新定位自己的活法，调适好身心，放下身段，入乡随俗，开荒种地，自称“东坡居士”。在贬谪黄州的日子里，被剥夺了实际权力，让他有大量的时间体验生活、反思人生，沉醉在文学艺术的世界，终于体验到了人生的真谛，因而写出了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前赤壁赋》《后赤壁赋》等大量脍炙人口的佳作。这个伟大的哲人，从“拣尽寒枝不肯栖”的孤愤，变成了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的旷达。

今天再读这篇谢表，我们透过苏轼这段不凡的人生经历，体会到宝剑锋从磨砺出，梅花香自苦寒来的道理。体会到真正让人成熟的，或许不是成功，而是人生中的坎坷和教训，尤其是关涉生死的教训。苏轼用一篇近乎屈辱的谢表，换来了下半生的活路，哪怕卑微一些、尴尬一些，但无伤大雅。只要接受了现实，自己认为不尴尬，那尴尬的就是别人。何况历史已经证明，苏轼本身遭受了冤屈，这并不是他的错误，而是历史的错误。在扭曲的现实面前，个人是渺小。透过历史的烟尘，我们回望那个在雪地里低头认罪苏轼，几年后却站起来，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高大的背影之一。

所谓大丈夫能屈能伸，苏轼就是。在生死面前，他选择了生。哪怕受再大的委屈，先活下去，才有明天。如果死了，就什么也没有了。透过历史的云霄，我们看到，一代文豪苏轼的忏悔，不是终点，而是一场伟大的转折。这忏悔，终成绝响，在历史的时空中余音不绝！

# 简淡皎然

杨村



唐代诗人中，像皎然老师那样简淡的不乏其人。王维、孟浩然、裴迪、柳宗元，都属此类。今天，我为什么说起皎然来呢？因为我刚刚又诵起了他的《寻陆鸿渐不遇》一首，联想起丘为的《寻西山隐者不遇》，贾岛的《寻隐者不遇》诸首。

想想，古人的生活是很有意思的。在家呆久了，想起自己的好友，便贸然前往，去寻友人聊天、话酒，吟诗作对。——当然也只是有闲阶的日子！换是“带月荷锄归”的锄劳功烈者，哪来如此闲情雅致？因为通讯的闭塞，兴致勃勃而去，友人常常不在家，关门闭户，只好看了看友人生活的环境，闻闻友人的气息，或者向邻人打探一下友人的行踪。若是山水清秀，赏心悦目，就会睹物思人，诗兴勃发。回到家中，吟下一首“不遇诗”，以寄托对友人的思念之情。皎然去访问陆鸿渐时，邻人说他“报道山中去，归来每日斜”。贾岛访友时，童子也说“只在此山中，云深不知处”。丘为则要洒脱一些，写道：“兴尽方下山，何必待之子。”游兴已尽，赶快回家，我何必非要等到你这隐者不可？后人老村去镰刀湾访老贵扑空，回来则是“老贵何所之，倚木问山阿”。然而山阿无言，只好怅然而返。老村是“为赋新诗”，忸怩矫情一回罢了。

陆鸿渐是谁？陆羽也！陆鸿渐同志小皎然二十七岁，他们俩属于忘年之交。可以说，皎然老师是陆鸿渐生命中的贵人，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，得到皎然的悉心呵护、帮助，成了一代茶专家，写下了中国第一部茶专著《茶经》。他对茶的试验和观察基地，正是皎然住持的寺院的花园，生活上也依托皎然提供的方便。

提起古人通信闭塞的生活方式，我想说句题外话。我幼年时跟随父辈转山，如果有同道在后面，远隔一段路程。每到一处岔路口，他们总会折一枝树桠，或打一个草结，指向去路。跟随的人就不会迷路，就像如今的路标，或者导航系统。古人的方式，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，都要比今人诗意和浪漫，并赋予人无限的想象力。

顺便说的是，皎然是唐代最杰出的诗僧，且精通茶道。注意，是“最杰出”。他的俗姓为谢，是南北朝时期杰出诗人谢灵运的第十世孙。祖孙俩相隔三百四十五年。

静值得珍惜，值得用一首诗来纪念。

## 山顶与寺:精神自画像

《说山道寺》是蒲秀彪这十首诗中最长的一首，也是他的精神自画像。“很多东山/我都没有进入东山寺/只是在东山的小径/走走，看看/闻闻山中花草香/听山中鸟鸣。”不进去，只在外面走。当有人问夜上东山干什么，他的回答是：“一不烧香/二不拜佛/三不偷/四不抢/也不为东山再起/爬上去/只为了站在山顶/看看夜色中的城。”不烧香不拜佛，不为东山再起——站在山顶的理由只是“看看夜色中的城”。

当下还有多少人敢这样说、会这样做？还有多少人入寺之时能够如此单纯与洒脱？寺里的师傅只有在被问话时才说话，还问他“施主要不要烧个香”——师傅也不推销信仰，而只是轻轻一问，这样的寺庙在当下似乎也不多见。结尾“东山有多高/我不知道/我只知道/东山寺/在东山顶上”——寺比山高，沉默比言语重。读完全诗，忽然觉得这东山之寺，仿佛成了诗人自己。不烧香不拜佛，只站在山顶看夜色中的城——这便是蒲秀彪作为一个逍遥派诗人的全部精神姿态。

## 结语:蒲秀彪的辨识度

蒲秀彪是一个在语言失效处追问存在的诗人。他的诗学路径与涂拥形成鲜明对照——涂拥以寓言为壳、以现实为核，在荒诞叙事的结尾揭开残酷谜底；蒲秀彪以不确定写确定，以消解写抵达，在语言的边界处追问大雪、大树、空与安静究竟为何物。涂拥是“照镜”，蒲秀彪是“追问”。他不断写下词语，又不断消解词语——大雪不是大雪，树不一定是树，空不是真的空，安静不是真的安静。但在消解的尽头，是更清晰的指向：说越越糊涂的大雪，最终成了满世界飞的“莫名其妙”；无法描述的大树，最终因为必须被说出而成为了诗。在语言失效的地方，他的追问才刚刚开始。

蒲秀彪，1980年生，贵州人，独立写作者，著有诗集《随时随地》《说山道寺》《本来如此》。我集中点评他的这十首诗，全部围绕“命名与消解”展开——写大雪、大雪不是雪也不是节气；说出一棵树，但树不一定是树；朝天空拍照，以为会拍到上帝，结果除了白什么也看不见；看云飘来飘去，飘来飘去藏着轮回；中国式父子，不见是牵挂，见面是孤独；母亲说拿不动八十斤就拿二十斤；写下“空茶几”，茶几便不再拥挤；人们走光之后，听见至少五种鸟鸣；高压制造的安静中，宁听原子弹爆炸也不要死寂；上东山，不烧香不拜佛，只站在山顶看夜色中的城。蒲秀彪的诗，从不给出确切答案。他用语言的自我消解，在命名失效的边界处追问存在本身——大雪究竟是什么，树究竟是什么，空究竟是什么，安静究竟是什么。

他是一个在语言失效处追问存在的诗人。

## 命名与消解:越说越糊涂的真相

蒲秀彪写诗，有一个独特的动作：先命名，再消解。他写下“大雪”，然后一层层剥掉这个词的全部外衣，直到露出最里面的“莫名其妙”。

《大雪》以一句“我写下大雪”开篇，随即自我否定——“天空并没有下雪”“我写的大雪/也不是大雪这个节气”。不是自然现象，不是节气名称，那它是什么？诗人坦诚：“我都不知道。”但“不知道”并不妨碍“向往”——“我只要大雪/大雪，大和雪，好大的雪。”在反复的自我否定与反复的渴望之间，大雪从具体的物象蜕变为一种无法命名的精神指向。我在点评中指出，大雪本是清晰的物象，至少具有清晰指向，却被诗人写得神龙难见首尾，这种表达方式很是新奇。结尾“只有莫名其妙/在满世界的飞”则将全诗推向更深的不可知——大雪最终成了“莫名其妙”，而这莫名其妙具有某种象征意味，超越了自然的大雪。《我见过一棵树》延续了同样的语言策略。“和之前见的/任何一种树/都不一样/我无法用语言/描述它。”说它是树，只是为说出它找一个理由——“其实树/不一定是

树”。命名是虚构，语言是无能的，但“我”必须将它说出。我在点评中以为，诗人连续采取这样的表达方式，或许与当下的舆论环境有关，“大雪”与“大树”的含义便变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当语言不能直说，便在说与不说的边界处生出另一种力量——在消解中反而更清晰地指向了那个不可命名之物。

《当时的天空》则以一个日常动作揭开更宏大的精神困境。“独自走在路上/我拿出手机/朝天空拍照/以为会拍到上帝。”拍照是实证的尝试，拍到上帝是荒诞的期待。“当时的天空/除了白/什么也看不见。”上帝本不存在，或者在这片土地上不承认其存在，那么用手机拍照只能有两种结

# 在语言失效处追问存在

——蒲秀彪其人其诗

吕本怀

果：拍不到；或者拍到了也只能说没拍到。“除了白什么也看不见”是唯一能拿上台面的结论。“独自走在路上”的“我”最终只能说“什么也看不见”——更何况那些集体走在路上的人呢？天空的白，是空无一物，也是被允许的唯一答案。

## 悖论与日常:在朴素处见最深的人生真相

蒲秀彪写人生，不写宏大叙事，只写最朴素的日常。但在这些日常里，他总能找到最深的悖论。

《与父诗》不过十五行，后三行将全诗推向共鸣的顶点。“多时不见/父亲/从老家来/陪父亲逛街吃饭喝酒/拉家常/很多心里的话/无法向父亲诉说/更难为情拉一下父亲的手。”逛街吃饭喝酒拉家常——亲密

的日常一样不少。但心里的话却无法说，拉一下手都难为情——情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被习惯阻塞。结尾以三行收束：“中国式父子/不见是牵挂/见面是孤独。”我在点评中感叹，区区十五字，却道尽了中国式父子关系的特征，并且具有巨大的普适性。牵挂与孤独不是对立面——牵挂是血缘的牵挂，孤独是两个沉默的男人面对面时的孤独。蒲秀彪用最朴素的语言写出了这个悖论的全部真相。

《母亲如是说》则以对话的形式写母亲无可辩驳的善良与勤劳。三次“我劝”，三次“母亲说”——劝别种地了，她说“地不种就荒了”；劝把牛卖了，她说牛怀了小牛，“杀一牛丧两命不好”；劝年纪大了该

# 在语言失效处追问存在

——蒲秀彪其人其诗

吕本怀

休息，她说“拿不动八十斤就拿二十斤/闲着没事/一天那么长/怎能到天黑”。诗中的“母亲”很有代表性，善良与勤劳是中国农村老年妇女最主要的人格特质。“拿不动八十斤就拿二十斤”是全诗最朴素也最坚初的句子——能力在缩减，但劳动不止。“一天那么长，怎能到天黑？”这是母亲的全部哲学，也是她全部的生命力。

《空茶几》则以一张茶几写尽理念的力量。“茶几上堆满了/各种各样的东西/多少次，他在想/把多余的东西扔掉/直到现在，茶几上/仍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。”想扔，没扔——这是一个死循环。“于是他写下：空茶几/当他写下空茶几之后/茶几上的东西/显得不再那么拥挤/仿佛一张空茶几/就出现在他的面前。”写下“空”，茶几便不那么拥挤——是词语改写了现实，还是现实在词语面前退让？我在点评中认定，这充分见证了理念的力量：从理念上腾空

了自我，才因此觉得茶几上的东西不再那么拥挤。同时这诗也有讽喻——针对一个擅长于运动与口号的国度，运动一来、口号一喊，似乎很多问题迎刃而解，但事实上问题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。茶几堆满东西，写一个“空”字它就空了——这是理念的胜利，也是现实的悲哀。

## 安静与逆反:在死寂中渴望爆炸

蒲秀彪写安静，写的不是安宁，是高压之下的死寂。

《高压》以令人窒息的语调开篇。“太安静了/几乎听得见无聊的/死神敲门的声音/这安静让人恐怖/这安静让人压抑。”安静不是安宁，是高压制造的死寂。我在点评中强调，高压所制造出的安静并非真正的安静，因此难免让人觉得压抑与恐怖。

但全诗最锋利的一笔在结尾：“在这恐怖的安静中/他甚至乐于欣赏/恐怖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/包括原子弹爆炸的声响。”宁听原子弹爆炸，也不要死寂——诗人着力凸显了在高压下人们的逆反心理——高压想得到什么，有可能一时能够得到，但长期如此，终究会有炸锅的那一刻。

《我听到至少五种鸟鸣》则是高压解除之后的片刻喘息。“过年了/人们都走光了/机器停止轰鸣/我一个人，在办公室/听到至少五种鸟鸣/先是喜鹊和八哥/再是山雀和鸚鵡/现在是画眉。”人走光，机器停，鸟回来了。我宁愿其中并无任何微言大义，而只是对真实情境的实摹——在城市里居然能同时听到至少五种鸟鸣，这种安